

摧毁日记的革命

文/王友琴

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毁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此外，文革还破坏了什么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识到的一项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

很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过的、所想过、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写下来，或长或短，积在一起，成为生命的一份记录、个人成长的一道轨迹，也是自我反省和心灵探索的一种方式。日记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当我收集记录文革受难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往往记得什么发生了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几位记性特别好的被访者，他们能讲出人物、情节、场景、声音，往事像电影一样存在他们的脑子里。然而，他们却往往记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记得在哪一年。

为了确定一个受难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复追问，比如仔细回想是在某个有记录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后一类；或者交叉核对，询问好几个当事人来弄清楚某个日子。但是那样做也仍然常常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被访者说：“假如有日记可查

就好了。”“如果当时把这些写在日记上，现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时候没写日记。”

这种时刻，我常常会觉得遗憾。个人的记忆汇总起来，会逼近历史的总体再现。可是这些像没有日期的纪录电影胶片一样的记忆，必须通过具体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后连贯。个人的记忆也只有准确的时间坐标中，才能和他人的记忆汇合成真切的整体画面。

于是，我开始询问被访者们是否写日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长者Y对我说：“假使那时候我写日记，我会记录下来很多事情，对写文革历史会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写日记，我绝对不可能平安活到现在。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有对文革的个人即时记录。”

他的旁边站着他的妻子X。他们是我的同学的父母。他们那时候是60来岁，都是性格开朗幽默、喜欢表达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候就喜欢写作，文革后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们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隔离审查”，受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处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几处。几个中学还未毕业的孩子都被送到边疆农村，以后也全都未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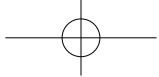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孩子很年轻就身染重病以致终身残疾。

确实，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们一家的遭遇相对来说远不是最悲惨的，因为他们家没有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文革中的“自杀”与通常意义上的不同），没有人被判刑关进监狱。但是，他们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长期的痛苦是显然的，而且是在他们长期隐忍不抗议不争辩甚至连在日记上都绝不略有微词的情况下，他们才没有遭到更坏的命运。

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常常误以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为他们反对或者抗议了文革而遭到惩罚，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动出击对千百万人实行各种迫害。无数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极少。观察历史，会发现广大受迫害者的忍气吞声和隐忍顺从是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残忍是很突出的，残忍到了连写日记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程度。

正如这位长者所说，要活下来（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来，而只是像他们家那样痛苦地活着），就不能写日记，要写日记，就不能活下来。他指出了日记和活命相关联，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文革的严酷性。我了解到的事实告诉我，这绝不是夸张性的说法，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

当时，我看着这一对老人，心里



想：无数人在文革中死去，无数的家庭被破坏，他们一家度过了灾难，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平反”了，全家团聚了。相形之下，没有写日记，失去了个人的记录，确实只是一种不严重的损失，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了。

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日记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应该被记载。不但应该记载因写日记而被害死的受难者们的名字，记载把他们送上死路的时代氛围，而且也应该从中认识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会生活规则上造成的“革命”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导致的个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变形。实际上，种种扭曲和变形一直延伸进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个人日记以从中寻找罪证是普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和必要步骤。从日记中摘找出来的话语就可以作为罪证，进而对写日记的个人施加严厉的处罚。处罚包括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长期徒刑，甚至死刑。这种用日记作罪证的方法并非始于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规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严重的日记恐怖。

随之发生的是，人们停止写日记，包括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写日记的人。文革当局从来不曾下令禁止写日记，但是日记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斗争会”“牛棚”和“劳改”，威力远远胜过文字的禁令。同时，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日记可以算是“反动”以及应给予何种处罚，人们无从知道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更增加了日记恐怖的程度。



王本中。

开始时，我没有把“日记在文革中”当作专门调查题目。但是，随着我的调查笔记的日益积累，随着我对文革往事的思考，我发现，很多与日记相关的故事被我记录下来。当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会相随而来。一个小小的、常见的、并不稀奇的日记本子，把一些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身上的悲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故事体现了文革的一个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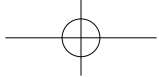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王本中老师，个子不高，相当瘦。1996年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校长。

他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数学教研组。除了教数学，他还兼任高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单身，就住进了中学三个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

1966年文革在中学里展开的时候，他在学校里算是最年轻的老师之一。6月2日学校停课以后，学校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攻击。有一天，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锅炉房的外墙上贴了一大片大字报，有几十张纸，不但字数多篇幅长，而且标题也特大，叫作：王本中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两年。他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相当受欢迎。另外，他把一些对数学特别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数学小组，进行课外学习。数学小组的学生进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到了好成绩，其中一个学生还获得了一等奖。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为数学教研室副组长。这一提拔在当时算是快的。提拔他时，副校长卞仲耘专门和他谈过话。但是也就在同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办学方针的“批判”也开始了。不久，他当班主任的高二（二）班里的共青团书记（一个中央政府部长的女儿）和一个将军的女儿等人，开始反对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王本中贯彻错误的“阶级路线”的结果。她们就要求立即进行班干部改选。

那时王本中以为，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是不过是“小业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已经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干部子弟没关系。关于改选，王本中认为惯



例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选举班里的学生干部，那时正在学期中间，没有道理重新选举。王本中去请示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梅树民。梅主任早他十年从北师大毕业，说：还是再做做要改选的学生的的工作吧。他们都没有同意在学期中间撤换“小业主”家庭出身的班长的要求。

班里开了两次会，质问王本中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王本中辩解，他努力执行了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都符合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学生说，这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是不好的。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在中学校园里开始了。青年教师中，王本中最早变成运动对象。一开始是“小字报”，贴在教室里。小字报说王本中“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革命干部子弟”。王本中指导的学生“数学小组”成员被称为“不关心政治”的“白专”学生，王本中则被指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后来，这些内容又写在“大字报”上贴在校园里。事态愈演愈烈，以致贴出了那份长篇大字报。

学生的那张大字报把王本中平日的种种言行，都列为“反毛泽东思想”——当时最严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这还不够，这些学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记。

现在的人会觉得诧异，怎么学生要老师交出日记，老师就一定得给他们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有“个人权

利”“个人隐私”“无罪推定”这些观念。文革不承认这些观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记。回顾文革历史，我们更能理解这些观念对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么重要。

王本中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学以及直到那时的所有日记，一共八本。交了日记，王本中心里还存着希望。他想，看了日记，学生会了解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是，一个星期后，校园里又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大标题是：“从王本中的反动黄色日记看他的反动世界观。”

说他的日记“反动”，证据是他在高中时的日记里，写到他的一位同学。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学上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有一段时间讲“新闻自由”，同学们讨论问题，王把这些讨论写在了日记上。后来，四中当局整理了这位的言论，上报到共产党徐州市委。市委认为Z是“极右分子”，不过因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太年轻，所以不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学，并且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王本中在日记里写到他 and 当时的班主任的谈话。他告诉班主任他觉得对这位同学的处分太重。至于“黄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记里几次写到过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女

同学。——在日记里，王本中没有反对“反右运动”，只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疑问。至于对异性的感受，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感情。日记是私人物件，也正是表达和整理这些感情的合适的地方。

王本中觉得这样“批判”他的日记是断章取义，是曲解，想把日记要回来加以解释。他要求学生把日记还给他。学生拒绝还，后来又说“丢了”。他要求学生把他的日记交给当时上面派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审查，也没有结果。事实上，这八本日记后来再也没有回到王的手中。

笔者收集到了一些该校当时的材料。在1966年7月，领导该校的“工作组”写的送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他们把女附中定为“(第)四类学校”，把副校长卞仲耘和胡志涛划成“四类干部”。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和教员都进行了“排队”并分成四个类别。有的地方把学生也分了类。其中第四类是最“坏”的，属于要清洗和专政的“阶级敌人”范畴。看到在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组提供的“根据”之一与王本中有关。

工作组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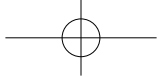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他们（指女附中的领导核心——笔者注）在青年中还宣扬成名成家个



北师大女附中校徽。



文革时的北师大女附中。



人奋斗的名利思想，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卞仲耘就曾号召数学组“要培养出几个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还鼓吹学生要学习文学，将来好当“党委书记”。对那些只专不红的教师和学生大加赞扬，推崇备至。如数学教师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在学校中公开宣扬“要学习居里夫人”，鼓励同学“要为这个理想，去努力奋斗，废寝忘食”。有的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整天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一心想当居里夫人。而校领导却认为王是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当时可以把一个中学定成“四类”的“理由”。分配来校的一个数学教员的父亲是地主以及曾经告诉女学生要学习居里夫人，就是把两名副校长划为“敌人”的证据。这种口气，这种逻辑，体现了那一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残忍。而且，这份材料并非出自中学生之手。当时在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原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副组长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会长，资历级别都不低。在西城区统筹指导“排队划类”的则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之一的胡启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这份报告上签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3日。这份材料当时上报给高层领导，却从来未问过王本人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原话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么，也未说明在引号里引用的话是由谁作证提供的。

在对学校领导人的全校性的“揭发批判会”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问题”和“揭发黑帮”。在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上，他的名字还被根据谐音写成侮辱性的“王八种”。女子中学的学生会有这种肮脏联想和骂人方式！

实际上，文革在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之后产生的这种野蛮和粗鲁，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组把女附中全体教师集中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所有的教师都必须住在那里，整天开会。每个教师都必须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认罪。一些学生积极分子也参与组织整老师。数学教研组有两名“特级”教师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两名教师被排作该教研组“最坏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坏的”。两名老教师有三十多年教龄，级别也是中学教员中最高，确实属于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资历浅而级别低，不该算是运动重点，只是由于他指导的数学小组获奖，加上他写了那些日记，他也成为“重点对象”。

在“集训”地，每个老师都要反复检讨认罪，才能“过关”。顺序是从“问题较轻”的人开始。还没轮到王本中检讨认罪的时候，上面忽然宣布撤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紧接着，7月31日在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红卫兵代替工作组控制了学校。

1966年8月5日，学校的五名领导人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斗争”。卞仲耘副校长被当场打死。教导主任梅树民被用带钉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衬衫的布丝都被打进肉里，揭不下来。他因此后来患了心脏病。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王本中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学校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暴力在各地升级发展。8月下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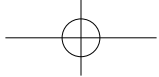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该校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十八岁的女服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实验室靠着校门，来来往往经过的人都听到了惨叫声。

红卫兵不但打校长、老师和校外的“牛鬼蛇神”，还打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王本中当班主任的班上，有13个这样的学生。该班红卫兵命令这13个同学跪在教室的地上，“斗争”她们。

30年后王本中谈到这件事情，仍然感到气愤。他说，竟然这样对待这13名同学，而且后来也不道歉。这个班的学生从此分裂为二。文革后的校庆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为这些打了同学的红卫兵忘记了这件事吗？还是他们假装忘记了？还是根本不认为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师显然知道要教育这些不道歉的人改变已经太晚，然而希望帮助现在学校里的中学生从文革历史学到道德的教训。现在他是这所中学



的负责人。在我们的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他自己的文革思想经历。

红卫兵在8月18日集会后所做的事情，当时他们自己称作“杀向社会”。他们在校外抄家打人，烧书砸文物，还得到免费火车票以及食宿到外地“革命串连”。在北京，从8月下旬到9月初，有两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该校所在的西城区人数最多。王本中的“问题”一时无人过问。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单身宿舍的几个年轻的单身老师一夜未睡，讨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该怎么做。讨论的结果是，跟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们现在应该革命，应该彻底摆脱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立即采取了两项“革命行动”：一是学红卫兵学生的样子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的一首词里找出一个短语“奔腾急”作为名字，并且用这个名字连夜赶写了几十张纸长的大字报，表示他们要积极投入文革。二是卖书和烧笔记本。他们把自己的旧书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几分钱一斤卖掉，把以前做的学习笔记，包括日记本子，全都烧掉。他们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要改变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时代大势抛弃。

回首往事，我们会看到，这种野蛮的高压和狂热的气氛的结合，远比理论说服有威力，真的会使一批人很快转变，投入声势浩大的革命，和过去决裂。烧掉笔记日记是一个象征。但是又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不再坚持理性，不再认真思索，随着权力指挥棒和大潮流走，才会有亿万人紧跟文革领导人走的现象。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反省和警惕，应该是我们能从文革

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训之一。

后来，王本中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又为“战备”挖过城墙，修过地下防空洞。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学校已经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应的改动。三十年后，王本中当上了这个重新又成为北京最好的、最难进入的中学的校长。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文革最终并没有造成多少改变：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赏识的青年教师，三十年后的校长选择看起来倒好像正是那时的选人趋势的结果。走过了一个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的原点。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转的惨痛的事情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他的学校中，校长被打死，四名教师遭到迫害而“自杀”身亡，还有四名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疗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残疾人工友受到攻击后失踪。

还有一样后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从1966年他班上的学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记横加攻击并且从未归还之后，王本中再也不写日记。如果我不问，也许他甚至不会向我提到这一点。关于写日记这一习惯的改变到底对他个人或者对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义，则是我至今还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回顾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师告诉我，在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成为“监控对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网右派”问题。在“搞完”第三批人的时候，他被“解放”了。然后开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并把他们关在宿舍楼的地下室的时候，他被吸收参加整人。他不算

整人的骨干，但是开会的时候跟着喊“你老实交代”，另外，还跟着“专案组”调查同事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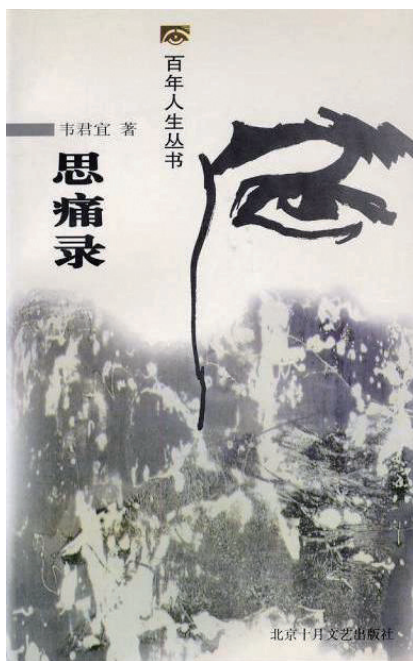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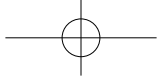
他在1996年告诉我，他在当时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内疚。因为自己的地位从被审查变成了被信任，虽然还不是被依靠，觉得自己应该“积极要求进步”。当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查阅“青年军”（抗战时期由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军队，文革时被指为“反动组织”）核心组织的名单，看到一个该校语文老师名字。这位老师当时已经被“隔离审查”。当王本中和另外两个一起去“外调”的人发现了这个名字，就当作“重大成果”回校赶快报告，连夜审讯这位老师，逼迫他承认。王本中说，当时出于邀功心理，很对不起这位老师。而且，后来还发现并不是那名老师，是一个同名的人。

为做文革历史调查，我访问过很多人。在我的经验中，很少人愿意说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错事。王本中身为一校之长，而且和我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谈话，一个小时后就跟我讲出他做的“错事”，我是有些惊讶的。于是我也想到，虽然他后来不再写日记，但是他原来是多年一直坚持写的，从中学时代写到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写过八本日记。我能隐约觉出，当年认真写日记的习惯和他道德感的养成是有内在关联的。

三

发现受难者陈沅芷的过程颇为复杂。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告诉我，那里在1966年有一名老师被红卫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



舒芜。

愿深谈（他那时是一名红卫兵），也确实不记得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记下这件事，以后再作探究。

1998年，韦君宜出版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文革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见该书第九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沅芷”的名字。因为书中只有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就设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学校询问有关详情。育英学校的一位愿意帮助的教员说，那里并没有过叫这个名字的老师。我很困惑。那时韦君宜还在世，但是已经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思痛录》写于更早的年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惭愧的是，分司厅中学的受难者始终没有能找到名字。）

后来，有一名老同学看到我的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后告诉我，舒芜先生的妻子是个教员，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为文革后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芜的名字。这位老同学还给了我舒芜女儿的地址，他的女儿是一位文革后出现的新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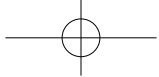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我写信给舒芜女儿却未收到回信，就给舒芜本人写信。没有地址，信是寄给出版社转交的。那时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传》。不久就收到了舒芜先生回信。他说，他的亡妻名叫陈沅芷，原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9月8日在学校被红卫兵打死。

原来，陈沅芷是第二十五中学的老师，难怪育英学校说没有这个老师。不过韦君宜并没有错。她是老北京人，第二十五中学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个私立中学。在众多的共产党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只有韦君宜这一本，把她所认识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

字都写出来，其中不但有她的亲戚和朋友，而且作为领导干部（她长期担任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她还一一写出了该出版社被集体送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后八名工作人员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陈沅芷在1958年调到第二十五中学以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是韦君宜的下属。韦君宜在书中虽然没有详细写到陈沅芷，但是没有忘记她。正是这种对受难者的记忆和歉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她追随一生的“革命”的批评，表现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则，使得《思痛录》这本书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陈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记直接相关。

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和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上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按语，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牵连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这样构陷做成。舒芜原来是和



胡风等非常接近的人，由于他最先交出了胡风和他的通信并且揭发了这个“集团”，没有像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那样遭到逮捕关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还是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级处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城里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陈沅芷和舒芜在崇文区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时只有舒芜的母亲在家。舒芜被关在他的工作单位的“集训队”中不能回家，陈沅芷平常住在第二十五中学，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红卫兵看到了陈沅芷的日记。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记。那一年9月舒芜在八达岭农场参加植树劳动，原来以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过国庆节，但是9月末宣布别人按原定回京，“右派分子”却不能回。舒芜写信通知了家人。陈沅芷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记中发了几句牢骚。因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记本，所以现在无从看到原文。

红卫兵说这是“反动日记”，立即赶到第二十五中学（在东城区），把陈沅芷抓到崇文区的家中来“斗争”一番，又送回第二十五中学。

这样一来，陈沅芷在学校的身份就一下子从“普通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关在校内，和其他该校



已经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以及红卫兵从校外抓来的“地富反坏右”等关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内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在北京第十三中学，这样的地方叫作“红色恐怖讯室”；在北京第六中学，叫“牛鬼蛇神劳改所”。）

一名该校学生说，有一次“斗争”陈沅芷，红卫兵的一个头头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高高站在上层。“斗争会”结束后，他们把两层桌子推倒，陈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上。

陈沅芷被关在学校两个星期，与家人隔绝。1966年9月8日，陈沅芷死在学校，时年42岁。

她的丈夫舒芜从自己单位的“集训队”被叫到第二十五中学里。他看到陈沅芷的尸体躺在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有血迹。一名红卫兵向舒芜训话：“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绝食而死。”他们叫来了火葬场的收尸卡车，叫舒芜付了火葬费，命令两个也被关在“教育室”里的该校老师和舒芜一起把陈沅芷的尸体抬上了运尸卡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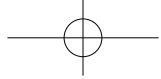
像当时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样，陈沅芷的尸体不标姓名地被烧掉，骨灰被丢弃。被红卫兵作为殴打关押她的“理由”的日记，也完全没有了下落。

十二年后，陈沅芷的家属得到了一纸她的“平反”书。由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共产党支部和“北京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逝世的结论意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

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年11月。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像陈沅芷那样被打死的人，仅仅在北京就有两千多人。同时，红卫兵还把十万多北京居民驱逐出北京，并烧毁和破坏了无数书籍文物。但是在文革观念的引导下，打死“阶级敌人”被视为理所当然，像陈沅芷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的死亡，根本不被关注。甚至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观念依然延续。在我1995年发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后，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质问：写这样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思？这种观念压抑了对文革受难者的历史记载。陈沅芷的丈夫和女儿在文革后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写到过她。是《思痛录》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为对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领导人除了发动革命，也大力从事写作他们的文革历史来进一步确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则。1966年底开始筹备一个大型展览会，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两次用毛笔为这个“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题字，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林彪显然大力支持鼓励这个展览。1967年夏天，这个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苏联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后改名）举行。展览上有一张大幅图表，题为“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据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统计”。其中的“缴获品”有12种。在“枪支”“弹药”“凶器”“地契变天账”“反动旗子”后面，赫然是“反动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

日记诗文”，下面列出的数字是“6820本（篇）”。

写作了这“6820本（篇）”“反动日记诗文”的人的数目，显然会很大。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毒打和虐待？他们中多少人为此失去生命？实际上，关于红卫兵的“战果”的表格还有一个只在高层传阅的版本，那个版本上多几个栏目，一项是北京没收私人房产52万间，一项是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赶出北京的“黑五类”8万5千多人。

陈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间的一个，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统计在内了，因为这个数字是作为“统计数字”用的，并没有附上具体的人名。当然，很少人知道陈沅芷的名字，但是类似她所遭遇的这样的虐杀当时在北京完全不是个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公然进行的。这些行动当时一再受到官方媒体的赞扬和鼓励，而且一年后红卫兵的暴行在这样

的展览大厅里再次受到高度赞扬。如果说陈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杀还可能解释为个别红卫兵或者个别学校的红卫兵的残忍所致，那么，在这个林彪题字、江青等光临的展览会上，这些暴行显然已经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种普遍施用的革命规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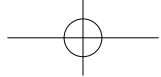
从展览大厅这张图表下走过的人，大概会感觉到这种警告：你写日记诗文了吗？

在1980年代，给文革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给1955年所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那时候我数次听到年长的学者们议论到陈沅芷的丈夫舒芜。有一名老学者说得较重。他说，出卖师长朋友，可谓“无耻”。

然而，议论归议论，从来没有见到真有人在书报上发表这样的议论。我曾经想过，舒芜并非有权有势批评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又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是禁区，为什么不

能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告诉人们当时他受到了怎样的压力，以说明历史真相。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不但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讨论文革是禁止的，从道德角度来批评谴责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许的。舒芜在1955年做了毛泽东需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称作“告密”或“出卖”或“背叛”，不允许用中国传统的道德品质层面上的用语来描述和批评。

对于文革的发动，官方正式文件归结为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的“错误”。这样的解释明显不能说服人。于是，只有采取压制手段，不准普通学者出版印刷关于文革历史的文章和书籍。也正因此，文革历史长期以来被含糊其辞，日渐淡化消解，像陈沅芷这样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说她那招致杀身之祸的日记和北京那被红卫兵抄家收缴的6820份“反动日记诗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数次访问刘美德老师。她1952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化学老师。

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写信说：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传记里面。

“红旗战斗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大力推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共三大类，把“黑五类”子弟称作“狗崽子”。他们殴打老师、校长和“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还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吴素珍、陈彦荣和一名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却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学文革后清查文革死亡人数，把她列为“无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说，打她的红卫兵其实是知道从哪里把她抓到学校来的，只是他们不说。

在1966年，北京大学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为严重和残忍的学校之一。

目击者说，红卫兵在学校里“斗争”刘美德，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

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她说，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红卫兵非常兴奋，说《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照相了。红卫兵强迫刘美德爬上方桌子并跪在那里。高三的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名记者照完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类似的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在学校被毒打，脾脏破裂死亡。

因为想要叙述暴力怎样在北京“红八月”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了血腥的8月末每天打死几百人的整整一个星期，我问起记者拍摄那张照片的日期。但是刘美德说不记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几名受访学生也记得这个场面。有一个女学生说，她当时吓得闭上了眼睛，生怕刘美德肚子里的孩子会掉出来。但是，如我在本文开始的时候说的，他们不记得时间，不记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样恐怖的日子里，没有人写日记。如果写，也不写这样的事情。

记录这样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个专门词语叫做记“变天账”，意思是要在“变天”后算账。加上当时住房

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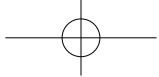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枪 支 2 6 8 支	弹 药 11056 发
凶 器 19676 件	地契 变天账 41294 件
反动旗子 1048 面	反动日记 诗文 6820 本(册)
反动证章 证件 14398 件	反动官服 9 0 2 件
黄 金 103131 两	白 银 345212 两
现 金 55459919 元	文物 玉器 613618 件



彭小蒙。



刘美德。



狭小和抄家成风，这样的记录很可能被发现和报告。如果发生，那么想要“变天”就是没有人能承受得起的大罪。

刘美德说，她以前是记日记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买最漂亮的本子来写日记。（记得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会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后来看到别的人“出问题”是因为写日记，就不再写了。特别是，比她在北大上学时低一班的女同学刘品馨，1953年毕业后留校在数学系教书，因为日记上被人发现了“反动话”和“反动思想”，被“斗争”了不知道多少次，被揪着头发打耳光，导致精神失常，再也没有恢复健康。

刘品馨的日记故事只会让我觉得胸口好像被针在刺。几年以后，我在采访笔记本上重新读到她的名字的时候，还想到，“品馨”和“美德”这样的名字含义相似，父母起名的时候都满怀希望要她们成长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却可能没有想到过她们以后会遭到这样的苦难。

一个在1957年就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被访者曾经提到，她不写日记，因为听到过一个说法：“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来作罪证，言论其次，思想如果不说出来，就难以被抓住。1957年划的百万“右派分子”，就是由他们发表的谈话（甚至只是在小组会上或者个别谈话中）或写出的文章来定罪的。他们落入陷阱遭到摧残20多年。

站在文革领导者的方面看，严厉惩罚“日记犯”有其“合理性”。1967年1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

干规定”，其中共有六条。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规定”所说的“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其实一般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极少人做过，后果是专政机构进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课停工有很多“革命群众”可以协助，审讯手段残酷，导致这类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为新一轮镇压的借口。事实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发生之后，人们已经被训练得绝不再对别人说任何不符合共产党要求的话。人们谨慎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他们不敢公开发表任何批评，哪怕在发生了1959~1962年间数千万人饿死的明显的人祸之后，也没有人公开发表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文革要继续挖掘“阶级敌人”以进行“阶级斗争”，必然要在人们的隐私写作如日记这样的东西上搜寻“罪证”。因为当人们不敢当众说真话的时候，还可能在日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另外，自从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抄家数十万户之后，抄家成为可以随便进行的行动，搜索日记一类东西，可以明火执仗地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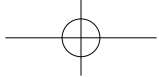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现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在1990年代，一个在1969年出生的读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问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时候被抓获的“反革命”叫“现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对。在文革后才上小学的人不懂这个词显然是个好事，至少这时

候不会再发动小学生来抓“反革命”了。这个词在文革时代却是连儿童都懂的。那时候还发动儿童搜索和“揪斗”“现行反革命”。文革时代这个词和所谓“历史反革命”相对使用，后者指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前在旧政府担任过职务和曾是国民党成员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现行反革命”呢？未经历文革者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可能只是在日记上发了些牢骚而已，别无其他。

刘美德老师说，她现在只有“效率手册”，用来记录要做的和做过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说，“效率手册”和日记是不同的。

五

郑培蒂老师1962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教授公共英语。她从小一直写日记。她的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那时派在西藏工作。他们之间有很多通信。路途遥远。前一封信的回信还没到，后一封信就发出了。所以他们制订了一套信件编号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号码，信上的交谈不会弄岔。文革一开始，看到年纪较大的教授干部被“揭发”和“斗争”，他们虽然因年轻而还不是重点对象，看到针对别人的恐怖行动，他们也很紧张。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来探亲，他们俩在北大校园的红湖游泳池边，把她大学时代和留校教书以后所写的日记，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全都烧掉了。那些编了号码的信原是他们夫妇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从那以后，郑培蒂停止了写日记。因为后来不再写日记，她已经记不得她的日记是哪一天



烧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时候的日记留在父母家。郑老师中学上过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我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女三中孙历生老师的悲惨遭遇，是她第一个告诉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谈话。她对非正义的敏感和对受难者的同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时候，这些日记被从父亲的工作单位来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亲是北京城市建筑委员会的工程师，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儿的日记当成父亲的了。郑培蒂小时候喜欢搜集新钞票，拿到新钞票就攒起来，舍不得用。她把这些新钞票夹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子里。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这些日记本从其父亲的单位里被归还。不过夹在日记中的那些新钞票都不见了。说起那些搜索检查别人日记的文革“积极分子”，他们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还有这类丑行。

因为失去了日记以及不再写日记，回忆文革往事的时候，只好以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记录在案的社会大事件为基准来判断。例如，是她生第一个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冲进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楼，押上一辆卡车，同时其他学生留在那里开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记、书信、笔记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来。她被押在卡车上拉到北大。进了北大南门下了车，有人从她背后用一个帆布袋子把她的头蒙住，又有人塞给她一根棍子。她什么也看不见，被棍子牵着走，进了一座楼，上楼，进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她头上的帆布袋子被打开。在北大校园里对付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28岁的英语女教师，用得着这样布袋蒙头的做法

吗？显然这不是为了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那些人的虐待欲望。

她被学生和当时的西语系“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审讯，还被强迫在审讯记录上按了手印。因为平常生活中从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动。当天夜里，她被关在那个楼里的一间小房间里，手脚都被绑着，她不能动。那一天是1968年5月17日。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生日有关而被记住。

之后，她就被关进了北大“牛棚”。那里原来是八个简易外语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改建为一座大型校园监狱，关押过200多名北大教职员。那个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轮美奂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

1968年6月18日，关在“牛棚”里的人被叫出“开会”。从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始，校园甬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几百米长。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树枝和铜头皮带。“牛鬼蛇神”们排队从路上走过，被夹在中间。棍子鞭子雨点一样落下来。他们都低头弯腰，只看到甬道两边很多人的脚。天气很热，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单衣，走过这种“夹鞭刑”后，双臂皮开肉绽。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长袖长裤，这样被打时就伤得轻些。但是郑培蒂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是什么日子。两年以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有学生对六十多个“黑帮”实行暴力攻击。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学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斗人者把厕所里的垃圾篓子套在被斗者头上，强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当时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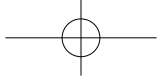
但是7月25和2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这一翻案导致了1966年8月红卫兵的残暴杀戮，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后几次“纪念”这一事件，把这个日子当作一种光荣来纪念和庆祝。每次“纪念”都伴有“斗争会”，简直像是“助兴节目”一样。这次两周年“纪念”，是最为狂暴而邪恶的一次。

郑培蒂因为忘记了“6·18”这个日子，没有预先穿上长袖衣服以备挨打。近年来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有时候被引用，“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说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听起来多少有些抽象。在郑老师那里，忘却了这个日期的后果非常具体，是一场原已非常严重的皮肉之灾和心理摧残的加重惩罚。

郑培蒂被关押了近一年——用了这样的不准确的时间词，是因为没有日记，没有记下她是哪天被放出来的。她只记得，她过生日的时候还被关着。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5月从家里被抓走关起来的。

她被关在大“牛棚”里一段时间后，又被关在27楼。在那里，她每天晚上可以离开27楼去外面的锅炉房打开水一次。她设法通知了从西藏来探亲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严寒中，她的丈夫悄悄来到锅炉房外面等着会她。他在大衣袋里给她带来几个金橘，一种生在温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连皮吃的特别的橘子，是她最喜欢的水果。这种约会很快被专案组发现而不能再继续。只是这一天的日期，因为这特殊的生日礼物而被牢牢记住。

郑培蒂被关押“斗争”的“原因”是什么？她的一个表舅是老共产党



人，曾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同居，远在毛和江结合之前。郑有一次告诉了一名是同学又是室友的人这件事。这是事实。但是说出这样的事实被认为会影响毛泽东和江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她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她刚被关起来的那几天，从北大校园到海淀镇上都贴满了“郑培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的标语。

1980年代，郑培蒂在电视上教授英语，她的教学方式和风度气质给观众学生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郑培蒂再次开始写日记是1982年，十六年之后。再次开始的日期不会被忘却，因为那已经被写下并被保存着。

六

极少人在文革期间依然一如既往地写日记，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许很多：那时他是一级教授，铁定了的“反动学术权威”，文革重点打击对象，日记这样的事情反倒不会成为他被清查的重点；他1966年时60岁，写日记的习惯更为悠久深厚，不易改变。另外，他的日记非常简短、客观、中性，好像会计的账簿。他不发议论，不臧否人物，不谈个人感想。这种类型的日记如被拿走审查，相对比较安全。他的行动表明他始终拒绝接受一种不准记录的生活，虽然他没有说及这一点。

在他的日记里，记有：

1966年1月14日，下午1：30入城参加市政协文教组讨论《海瑞罢官》。

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教授们专家们还并未都被当作革命对象来扫荡，

他们被发动跟着上面的指示“讨论”京剧《海瑞罢官》。虽然那篇在1965年10月发表的批判该剧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称作文革的发端）根本不像“讨论”，而是横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辩解，也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时，还是用了这样比较缓和的动词“讨论”，而不是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直截了当地要教授们去“批倒批臭”某书某剧某理论甚至他们自身。

五个月以后：

1966年6月18日，工作组张小山同志说，我不是名位思想问题，而是牛鬼蛇神，和陆平黑帮勾结。

这时候，教授们已经变成了“敌人”，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

1967年7月20日所记的是，他、吴组缙、魏建功、王瑶“被宣布停止劳动”。这几个名字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从中可以看到，从1966年夏天到1967年7月20日，这些教授一直

在校园“劳改队”中。这次放出来不久以后，他们又被关进了“牛棚”。关进去的日子没有被记下。

1968年12月9日的日记写道：

今天是12月9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韩指导员宣布从今天起，恢复我们五个人的自由（王瑶，章廷谦，阴法鲁，林焘）。上星期五（12月6日）已经恢复了魏建功，吴组缙，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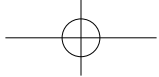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还写道：

“我虽然没有喊‘毛主席万岁’，但是我心里喊了。”

笔者读到这段日记的时候，王力先生已经去世。对最后这两句话可以做几种解释或猜测。也许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也许是为了写些这样的“套话”以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日记。也许是一种机智的讽刺，因为那时这种高喊万岁已经成了一套真假难分的仪式，而说这种话也成了一种常用的修辞方式。不管怎么解释，有



王力教授与家人。



一点是无疑的，这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你被审查被关押被打被折磨，然后你不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还得喊万岁谢恩。

当时王力先生在行动上难有选择，但是他记录下来这一点，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种保留评价余地的努力，也留给了后人一个可供分析思索的图景。尽管记录的内容是重要的，但是记录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记录是一种态度。

日记还记录了他“恢复”自由后所经历的：

12月11日，在东操场参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晚上11点，有人来查户口。

12月12日，写了“关于我家拆钢琴的经过”，又誊写“补充交代我的罪行”。

12月13日，领导上要我们写一篇参加东操场大会后的感想。

12月14日，上午九点一刻，中文系全体师生对我们九人进行批斗。（指上文所记的分别在12月6日和12月9日“恢复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没有这些日记，后人不可能知道被宣布“恢复自由”的具体含意是什么——半夜“查户口”，“补充交代罪行”，继续被“批斗”；也很难知道当时日复一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以及领导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做什么。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延续了一年多，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方法最为细密残酷的一场整人“运动”。其中有一项是整“反动言论”。当时的人说话已经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时候人也根本没有录音机

（录音机是在文革后才出现在商店里供普通人购买的），为了要坐实人们的“反动言论”，“专案组”的打手们使出各种手段，昼夜连续逼供，恐吓讹诈利诱，使用刑罚，还制造伪证。他们更高兴的是发现人们手写的东西，因为这样容易给人定罪。所以，他们搜寻人们的私人通信和日记，试图发现可能和“反革命”连挂上的词句。他们把这样的发现称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抓到的东西越多，他们的功劳也越大。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同时也因为这种严厉和残酷，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当时的记载也是最为稀少的。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记中，唯独缺了1968年初到12月9日期间的一段，显然是因为被关押在北大“牛棚”里面。“牛棚”中几十个人一间，都在地上打通铺。和王力先生在地铺上相邻的教授说，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员叫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他看到王力脱下身上穿的圆领白汗衫，背上布满了一条条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云告诉我，他抗战时期曾经在昆明西南联大，知道“云南白药”的功效，就带了一盒“云南白药”进“牛棚”，还曾经给一起关在那里的同事服用。“白药”用草药制成，传统上用于治疗金创外伤，抗战期间曾经为军队大量制造，文革时成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备品。

1968年6月18日，所有被关在“劳改大院”里的人被押到校园里，排列成队，从临湖轩走到大饭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这段校园中心的甬道两侧站满了人，有的还拿着棍棒和竹箴，殴打从中走过的“牛鬼蛇神”。多年以后，王力先生跟家人说，那场大规模

的毒打，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耻大辱。但是这些殴打都没能写在他的日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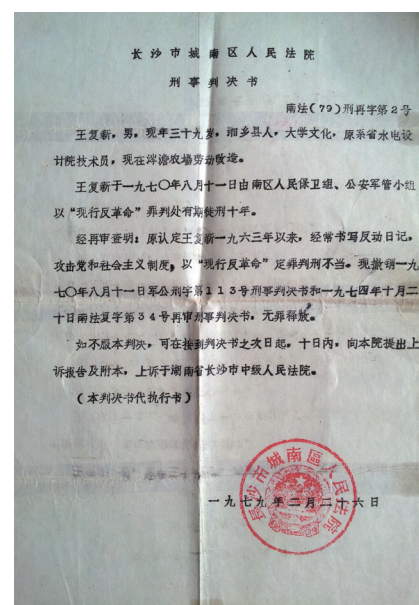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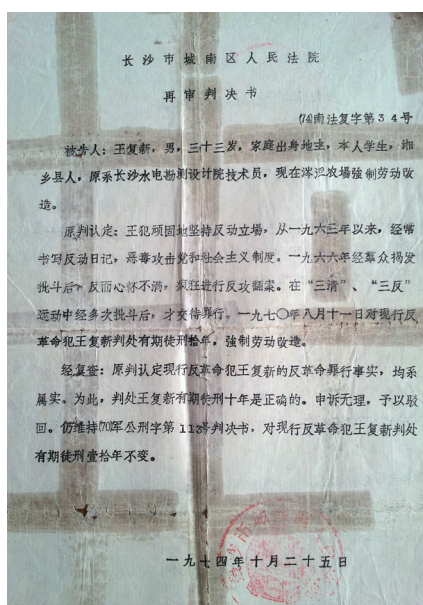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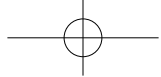
发生在1966年和1968年的校园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时，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写实记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得当时留下文革的真实记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确实，四十年后我们也未能发现当时秘密写成的为将来的人阅读的文革记录。）这些大规模的迫害不但控制当时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记录缺失的特性而影响相对当时来说的将来——即今天和以后，因为对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惨剧的防范，需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

七

当经历者依然活着，日记纵然失去，往事仍可补记，如果还有这种心思的话。但是，对那些因为日记而已经丧失了生命的人来说，生活和关于生活的记录都变成了无法逆转的死亡和毁灭。

王复新，1964年大学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是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的工程师。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中学老师。王复新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做工程工作，他读过的文学作品非常少，文学修养确实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经批评他“文学水平低”。王复新说，为了要女朋友高兴，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具体的方法之一是开始写日记。他希望通过写日记来“提高文学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记都给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后一共写了四本日记。



1970年，一个新的名叫“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运动开始了。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这个运动不但在各单位关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进拘留所，再由法院（当时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下）判刑，最后关入正式监狱或者送上死刑场。其中第一步在各个工厂学校进行，由这些单位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公检法军管会”商定抓谁。

王复新的日记曾经放在女朋友的集体宿舍里，被她的同学读到，而且被认为有“反动内容”，揭发出来。因此，他在他的单位里被“隔离审查”。他的日记里有一首表现思念之情的诗，被解释成“盼望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王复新说，这首诗甚至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有时候他无话可写，或者是为了学习别人怎么写作，他会从书报杂志上抄一些诗文在日记里。再说，如果他真的“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他与其写在日记里，不如设法匿名寄到境外去，还有可能逃过信检，送到国民党那里去。他说他写日记主要是为了取悦女友，

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王复新年纪轻，不可能在历史上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也不可能参加过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重点追查这两个“反动组织”的成员，不可能成为所谓“历史反革命”。日记的事情，他在被“隔离审查”之后仍然觉得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他虽然被关，却一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严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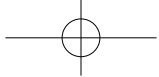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跟他关在同一间房里的人，比他年长很多，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当王复新被通知去参加大会并且听说可能要逮捕人时，他还以为是要逮捕那名“历史反革命”年长者。他劝那位年长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准备好直接从会场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样，身上多穿的衣服进了监狱可以有用。他是个关心别人的人。

他没有想到，结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众大会上，他当众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送到长沙拘留所。以后他既没有过自我辩护的机会，也没有过审判过程，甚至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判决书，他被口头宣布判了九年徒刑，

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王复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涪澹劳改农场服刑。在那里，犯人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而且吃不饱饭。他服刑期间，没有任何监狱外的人和他来往。没有人来探监，也没有人给他写信。只有他的一个在小县城里当小学教师的姐姐，不时给他寄钱，每次五元。这在监狱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羡慕。因为犯人家属经济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划清界线”，所以监狱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当时被称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区别——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济。五块钱对一个小学教员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王复新的姐姐虽然给他寄钱，却从来不给他写信。他写信给姐姐问监狱外边的人的情况，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谈这些，并警告他如再这样写信，她将中断寄钱。

毛泽东去世两年半以后，1979年3月底，王复新的十年刑期立即就要满期的时候，王复新被通知“无罪释放”并得到了法院的一纸平反释放通



知书。

看判决书和平反判决书，“日记”的作用，可以从中看得非常清楚。

王复新的遭遇，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从这些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过司法机构以日记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动日记”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现在北京官方举办的大报表上，而且出现在判决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说，日记罪已经进入了法律领域，体现了社会中最强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镇压的常规。

从1966年到1970年，文革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四年。从中学生红卫兵打死写日记的陈沅芷老师，到“公检法军管会”对“日记罪”的宣判，日记恐怖越来越系统化和严密化了。

八

日记恐怖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渐渐结束的。1978年8月10日，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组工通讯》上发出了一份《关于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指示》。

“恶攻”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缩略语。1971年林彪突然失势以致暴死之后，“恶攻”的宾语剩下了毛泽东一人。称为“恶攻”，是因为频繁使用，才产生了简称。文革中，遭到这个罪名危害的人不知其数。“现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之一，而“恶攻”罪又是“现行反革命”罪中最严重的之一。

“恶攻”可以被判处长期徒刑以至死刑。这个《指示》规定了有五种被指控为“恶攻”的人可以“甄别”“纠正”。这五种“恶攻”人的第三种和写

日记有关。《指示》写道：

第三种是，有的人对某些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在一定的场合或者书信、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说错了，也可以通过民主讨论、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乱扣帽子。至于有的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坚持正确的观点，反被定为散布“恶攻”言论，那就更不对了。

这个《指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真是性命攸关啊。一大批因“恶攻”而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认为再无希望翻案了。在这个《指示》下达以后，才有了王复新这样的人被释放出狱的新景象。没有被栽上这一罪名的人，那时候也松了口气，知道悬在头顶上的利剑终于解除了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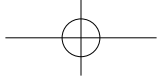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这个《指示》发出之时，正是胡耀邦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贡献很大。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因为文革迫害面的深广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们把这不正确地称作“纠正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在执法中发生的个别问题；文革发生的则是系统性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所据之“法”为非法。其实，把文革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并不符合事实，只是一个掩饰性的说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据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不能算法，但是当时也就是法）本身，才来纠正一个一个的“冤假错案”。

当时胡耀邦新法的贯彻过程并不容易。党治国的案例可以证明。他

是陕西人，1957年时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文革受难者》书中的陈祖东教授和李丕济教授都曾经教过他，这两位教授在1968年“自杀”。党治国在1958年2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有571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作为惩罚被送去煤矿劳动两年，回到清华大学当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资（一般毕业生为56元），处处受歧视。后来他回了老家陕西韩城农村，1962年“摘帽”，到铜川矿务局当了工人。

党治国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泽东在那年批示、1月31日开始的“打击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时。他被捕当天，还未审讯，就被当作死刑犯上报陕西省。上面认为数目够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个人，没有杀他。1971年他被判处20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经省里批准，市里上报备案就可以了。

党治国的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就是和几个年龄相仿的谈得来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读书。他写有日记并存放在朋友处。文革开始后，1966年，他想到日记里写了些有个人情绪的话，怕出问题，请朋友把日记销毁了。本来是为了安全才销毁日记，但是这个销毁了的日记一样造成灾难。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翻来覆去被强迫“交代”已经烧毁了的日记的内容。强迫他们互相揭发，编造他们有一个“反革命网”，逼他们陷害亲友。“小集团”中有一个女青年名叫李华莹，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能上大学，当了饭店服务员，仍然喜欢读书。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被“隔离审查”时，从五一饭店的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她死时28岁，她的女儿才8个月大。文革后



这个孩子去了澳大利亚。到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迫害更加升级。如果不是死刑上报名单上党治国的名字前面还有别的“现行反革命”，他也会被判了死刑。

文革后开始“纠正冤假错案”时，党治国提出申诉。（文革时，被判罪的人一律不准上诉。）结果是，1979年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把二十年徒刑改判为十年。法院写道：

原判党治国五八年二月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因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从六三年混入基建公司当工人后，长期书写反动日记，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党各项方针政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耻吹捧赫鲁晓夫，为帝、修、反涂脂抹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党治国对其原判不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我院及有关单位申诉其反革命言论不属事实，原判定性量刑不当。经复查认为：党治国自六二年以来，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不满到仇视，攻击言论是恶毒的，对党历来的各项运动和方针政策攻击言论是反动的。原判对党治国以反革命定性是正确的。其右派问题，清华大学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予以改正。偷听敌台、谈论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不属反革命罪。原刑期二十年偏重，故依法改判如下：

1. 对党治国以反革命定性不变。
2. 判处党治国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五日止）。

可以看到，在这份法律文件中，“书写反动日记”仍然被当作重罪。

铜川法院没有完全执行胡耀邦的上述《指示》。党治国再次申诉。在1980年他得到了平反。下面是判决书。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铜中法（80）刑复字第02号

申诉人：党治国，男，四十四岁，陕西韩城县人，原系铜川矿务局八十九工程处工人。

上列申诉人一九七一年因反革命一案经铜川市公安局管组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审仍以反革命定性，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本人仍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现经审理查明：

原判党治国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当工人期间，书写反动日记，仅系本人交待，证据不力。散布反动言论，未构成反革命罪。故判决如下：

一、撤销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刑事判决书。

二、对党治国宣告无罪。

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八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在关于“恶攻”的《指示》发放两年后，日记才终于不再是罪证了。党治国遭遇的痛苦虽然不能挽回，总算法律制度有了这一点进步。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九

胡耀邦的“规定”发出之时，已经是文革开始12年之后了。而实际上以日记治罪却在文革前就开始了。1964年7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一段谈话，高等教育部曾作为文件下达

（1964年11月9日）。这个谈话的传播对发动文革起过很大作用。

毛泽东：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的陈东平，就是“反革命分子”，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这就是他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者的定罪观念。这篇讲话的中心是强调“阶级斗争”应该是年轻人的“主课”。在阐述这个主题的同时，毛泽东显然也传授了他的这种对日记的定罪观念。可以说，文革中对日记的严厉惩罚，正是毛的这种观念推广实施的结果。



陈东平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毛远新的同学。当时哈军工因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学，学生中有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弟。1963年9月，公安部编印了一份材料，题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陈东平是其中一例。

陈东平的一名校友告诉笔者，那时候学校开除了陈东平，而且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教育全体学生。校方宣布的陈东平被开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陈东平在家养病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广播，书写了反动日记。至于日记内容，从来没有向学生公布过。他们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动”。

我问起陈东平的日记怎么会被报告上去的。这位受访者说，那时候学校宿舍里八个人一个房间，睡上下床，没有个人私密空间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为荣，而不是为耻，日记内容被同屋报告给上面，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名受访者还说，陈东平的父亲有上将军衔，当时担任大军区司令。他

被开除以外，听说还受到监禁。不过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样的事情，必定遭到更严重的处罚。不知道陈东平在文革中怎么样了。再也没有听同学中有人说起他。

另一位哈军工当时的学生说，写日记的人其实不是陈东平，也不是毛远新的同屋，而是另外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因为他的日记，受到了处分和迫害。那是毛泽东记错了人，把事情张冠李戴了。然而，毛泽东跟毛远新说的话表明的意思是清楚而严重的：写日记，就可以是“反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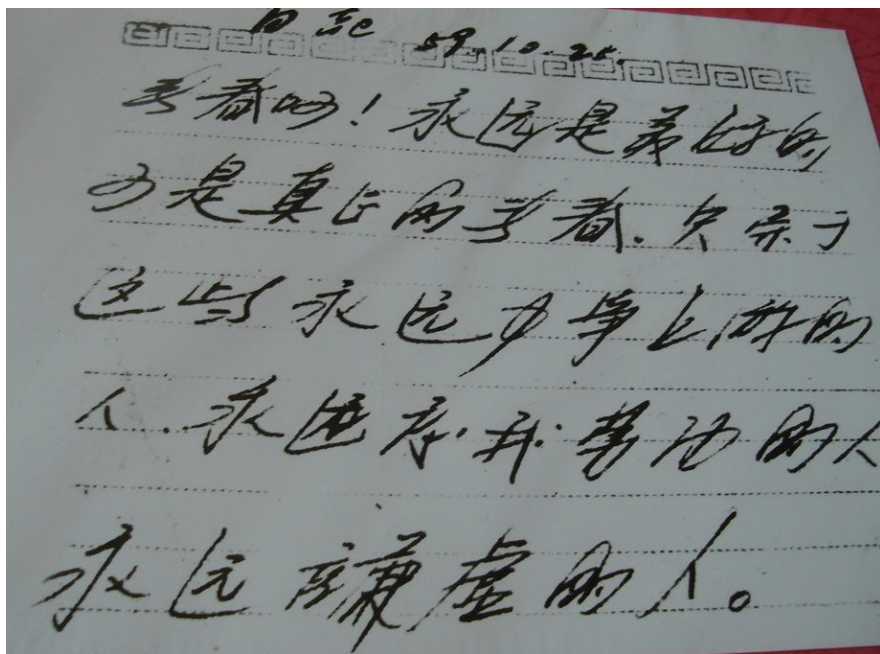
在把写“反动日记”当作“反革命”罪的同时，那时候当局大力提倡学习“雷锋日记”。雷锋日记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壮语，从内容到语言，都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日记”。在文革前夕，掀起过一股写雷锋那种“日记”的风气。那种“日记”在写的时候就是准备给别人看的，也会拿到“政治学习会议”上说。除了内容和语句方面绝对符合当局的革命宣传之外，没有隐私性也是雷锋式“日记”的特点之一。

聆听毛泽东这些教诲的侄子毛远新，在文革中飞快上升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9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在小组会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说了不同看法，9月24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张志新在狱中受尽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为“坚持反动立场”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张志新被送往沈阳大洼刑场枪决之前，她被反绑双手拉出牢房，还被用刀子割断了喉管，使她在所谓“公判大会”上绝对发不出任何声音。决定张志新死刑的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毛远新参加了张志新等人的死刑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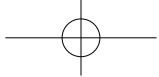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个谈话，当时由教育系统传达下去。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当局还特别召集只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议学习讨论。在1990年代笔者采访一名该校1966年红卫兵领导人时，他也谈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对后来产生的红卫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红卫兵是毛泽东推进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重要工具之一。

十

在所有的写作形式中，日记是很特别的一种，因为不是写给别的人看的。写日记，可能是人的所有行为中最为个人化的一种，并不是意在影响外界。当写日记会招致迫害和监禁，人们停止写日记。在这方面，文革成功地剥夺了人们思想自由的最后一角空间。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来称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于权力可以到达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极端程



雷锋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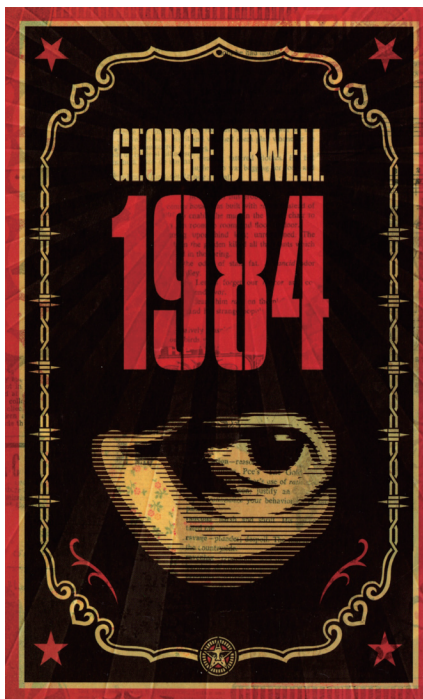
度,可能在各处有所不同,因此“极权主义”的实际含义也各有特点。这种对日记的摧毁,显然是中国文革“极权主义”的特色产物之一。

从古代以来,人们就写下了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人类对理想未来的构思和追求。我想不起来在种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有没有作家提到过日记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称为“反乌托邦”,即对未来坏社会的想象的作品中,《1984》确实写到了日记。在书的一开头,主人公温斯顿躲在他的房间里一个电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龛里写日记,虽然他知道被侦查到了的话可能判处25年刑甚至死刑。

在《1984》的世界中,“老大哥”的电子屏幕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人们;一群专职干部天天都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那里有“思想警察”当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里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为党根本不会让你到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的地方去慷慨陈述你的见解然后才把你杀死,党在把受难者送去公审之前就先用严刑拷打摧毁他们的尊严,然后让他们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温斯顿只有偷偷写日记。是为了谁呢?他想是为了将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人。他写了日记,记录和批评他所经历的。在书的最后,他被逮捕了,被毁灭了。

1948年用英文写成的这本政治幻想小说里,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后在中国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故事,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毕竟也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知道有预见和认识这种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顾并思考文革历史的时候,那些千万人的集会,大人物之间的冲突



《1984》英文版。

和勾心斗角,重大事件的发生,暴力和死亡,总是首先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争论。而像那个时代的人写不写日记这样的问题,也许因其安静和细小,可能就逸出了视线。

当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记录,媒体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实在很少很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是,离开了事实与经验,对文革的评价都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所以也就无从进行。

事实上,被烧掉的并不只是日记,而且还有个人对生活 and 自身存在意义的积极感受与反应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乐、愤怒和悲哀,人对事物的道德判断,如果被认为失去了被记录的价值,人就可能漠视了对人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我曾经和被访者讨论,一个社会,如果别的都还好,比如,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

的社会公平,但是,却不准写日记,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可被我们当作一个好社会接受呢?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有进行讨论和选择,我们会不会愿意牺牲写日记的自由,以此去换取温饱安全,就像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银子去换一包糖果?实际上,当文革进行之时,宣传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革命,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于是,不仅是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和镇压,而且对“人民”的居住和就业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包括对写日记在内的自由的剥夺,都可能被解释成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好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代价,而且允许我们选择,我们是否愿意做这一交换呢?

然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会清楚地了解到,这不是一个需要费思索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不能写日记的时代之后,人们已经看到在那样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并不曾因日记的消亡而改善,却分明是日益恶化了。那个时代没有日记,也缺乏食品、服装和住房,也难见信任感、友谊和道德。人们生活于贫困和恐惧中,精神和物质一样匮乏,头脑和肠胃同时空虚。

我们还找不出一个钳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写日记但是生产发达、物质丰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关于日记的历史,需要严肃认真地记录和讨论。■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任。)